

拉美社会

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的演进

——以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为例

范 蕾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第安人运动在拉美政治舞台上愈发活跃,成为拉美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个代表性国家为例,从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相互关系分析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演进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20世纪50—70年代,政府主导了拉美印第安人运动的组织化进程,双方为主导—从属关系。然而此后,民族认同开始觉醒的印第安人运动渐趋独立。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印第安民族认同复苏,拉美印第安人既要求领地、建立多民族国家和实现民族自治,又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主力军,与政府的关系转变为对立、对抗。2006年以来,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融合度差异使得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的关系出现两种不同走向。只有承认并尊重印第安民族认同,赋予并保障印第安人平等的公民地位和权利,才能处理好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从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

关键词: 拉美 印第安人运动 民族认同 多民族国家
民族自治

作者简介: 范蕾,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649(2018)04-0117-19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再度掀起社会运动高潮。军政府统治和暴力冲突结束,政治民主重建,新的诉求引发新的斗争。除了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工会,拉美政治舞台上涌现出很多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体,生态环保、女权、同性恋、消费者等群体提出各种利益诉求。在拉美,特别是在墨西哥、玻利维亚、秘鲁、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印第安人口比重相对较高的国家,印第安人运动是社会运动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印第安人贫困、受压迫受歧视的艰难处境,印第安人对领地、尊严和自治权的诉求,印第安人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念之间的矛盾,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融合度问题,都使得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几经起落。

学术界关于拉美印第安人问题和印第安人运动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偏重基础分析,从宏观视角认识拉美印第安人问题和印第安人运动。郝名玮以20世纪80年代以前玻利维亚印第安人问题及其斗争为例,认为应通过“民族一体化”将印第安人融入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①吴德明认为拉美印第安人问题主要集中在要求民族区域自治、获得合法土地权利等几个方面,并分析了“印第安主义”和“民族一体化”两种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理论。^②苏振兴探究了20世纪90年代拉美印第安人运动兴起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以及不同于以往土著人运动的新特点。^③徐世澄分析了拉美印第安人运动勃兴的原因及印第安人运动的特点、问题和前景。^④刘承军认为拉美印第安人实现了从“他人”到“我们”的崛起,拉美印第安人的政治运动带有印第安文化的底蕴,印第安人问题的本质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其问题的核心直指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质。^⑤方旭飞认为拉美印第安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左派政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印第安人运动与左派政党政治认同的差异造成两者间的分歧与矛盾。^⑥韩晗阐述了印第安文化中的“美好生活”

① 郝名玮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和“民族一体化”问题——玻利维亚印第安人问题例析》,载《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6-31页。

② 吴德明 《拉美印第安人问题》,载《世界民族》,1995年第2期,第35-44页。

③ 苏振兴 《拉美印第安人运动兴起的政治与社会背景》,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8页。

④ 徐世澄 《方兴未艾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运动》,载《中国世界民族学会论文集》,2012年8月,第1-4页。

⑤ 刘承军 《印第安文化与印第安政治运动的新崛起》,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9月19日第003版。

⑥ 方旭飞 《试论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左派政党》,载《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4-30页。

传统理念及其在当代拉美地区的政治实践。^① 笔者也曾探讨拉美宪法改革对印第安人权利的制度保障及其对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重要意义^②。此外，也有学者从国别角度加以分析，墨西哥、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问题都曾得到关注。国外学界的研究视角更为多元。宏观研究涵盖印第安民族文化特性，拉美印第安人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基本特征、核心诉求、问题及其前景，印第安人运动在全球化时代的反体制作用，妇女在印第安人运动中的作用，民族政策与印第安人运动，印第安人的城市化进程，当前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的冲突，印第安人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合作与冲突等。微观研究涵盖国别印第安人问题、国别印第安人运动和地区印第安人组织等。^③

本文旨在从印第安民族认同与国家构建的角度探讨不同时期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的特征和成因。拉美各国印第安人口占比不同，印第安人运动的基本特征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演进也有所差异。本文选取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个国家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因为两国在探讨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具有代表性和比较价值。其一，两国的发展模式对印第安人生存环境的冲击在拉美具有代表性；其二，两国印第安人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在拉美具有代表性；其三，两国印第安人运动的活跃程度相对较高，其主要诉求在拉美具有代表性，两国的多民族特征都得到了宪法保障；其四，左翼政府时期两国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的不同走向反映出两国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融合度存在差异，且在拉美具有代表意义和比较价值；其五，两国是拉美多元民主趋势的代表国家，对两国的研究有助于分析拉美民主转型在印第安人运动和政府关系演进中的作用。此外，将印第安人口占54%的玻利维亚和印第安人口占6.83%的厄瓜多尔同时作为分析对象，也使得研究更具全面性。

① 韩晗 《印第安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因素》，载《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52-59页。

② 范蕾 《拉美的宪法改革与印第安人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5-19页，第30页。

③ Paul Almeida, et al.,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America Latina: Perspectivas, Tendencias y Casos*,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CLACSO, 2017; Fabiola Escárzaga, Raquel Gutiérrez, Juan José Carrillo, Eva Capece y Börries Nehe, *Movimiento Indígena en América Latina: Resistencia y Transformación Social*, Vol. 3, 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Benemérit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Puebla, México, 2014; Ana Cecilia Betancur J. (ed.), *Movimientos Indígenas en América Latina: Resistencia y Nuevos Modelos de Integración*, IWGIA, septiembre de 2011.

一 拉美印第安人运动概述

拉美印第安人运动并不是社会运动中的新生事物，它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时期印第安民族反抗殖民者的斗争。然而，有组织的印第安人运动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精英政治危机之后，经历了从从属到主导、从分散到统一、从单一到联合的发展历程，成为当前拉美新兴而又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现象之一。

据美洲开发银行1999年的统计，拉美印第安人数量为3300万~4000万人，约占拉美总人口的8%。另据墨西哥印第安人问题专家鲁道夫·斯塔维哈津估计，拉美共有400多个印第安民族，4000万印第安人。^①拉美各印第安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对印第安人运动的研究不能仅从文化角度解释，还应关注到印第安群体的艰难处境。拉美印第安人仍处在社会最底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遭受压迫和歧视，大多生活贫困，居住环境恶劣。在不少拉美国家，印第安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仍未得到充分保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解放神学和新社会运动诞生。20世纪80年代，拉美民主政治回归。这些思潮和政治进程都对印第安人运动产生了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拉美地区爆发了两次影响深远的大规模印第安人运动：90年代初期的厄瓜多尔印第安人社会抗议运动和1994年1月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爆发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拉美印第安人运动的兴起恰好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发生在同一时期。与此同时，主张政府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盛行。90年代末，印第安人运动成为整个拉美大陆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之一，特别是在墨西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家。同时，印第安人运动也面临着内部分裂、与其他社会组织及政府的矛盾、跨国资本冲击等问题。

捍卫领地、资源和居住环境，获得应有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建立承认“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国家并实行民族平等与民族自治政策，是当前拉美印第安人运动的三大核心诉求。自1990年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起义以来的所有拉美印第安人运动，无不提出土地、资源等经济诉求和尊重、权利等政治诉求。在玻利维亚，基斯佩领导艾马拉人建立的“帕恰库蒂克印第

^① 徐世澄《方兴未艾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运动》，载《中国世界民族学会论文集》，2012年8月，第2页。

安人运动”（MIP）的核心目标既包括对印第安文化的认同，也包括社会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利诉求。

面对方兴未艾的印第安人运动，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开始关注本国的印第安人问题，调整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巴西（1988年）、哥伦比亚（1991年）、墨西哥（1992年）、巴拉圭（1993年）、智利（1993年）、秘鲁（1993年）、玻利维亚（1994年）、阿根廷（1994年）、厄瓜多尔（1996年、1998年）等拉美国家均通过修改宪法或制定新宪法，承认印第安人的权利和民族特征，承认多元文化，并在不同程度上保障印第安人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权利。大多数有印第安民族的拉美国家都承认印第安语言，并鼓励在印第安人聚居区实行双语制和多元文化教育。一些国家还专门成立了负责印第安民族事务的部委或基金会等机构，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圭亚那、墨西哥和智利等国。^①

二 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的演进

拉美印第安人运动源自印第安群体反抗压迫和歧视的自发斗争。但印第安人运动组织化并逐渐成长为独立的社会和政治行为体，却是基于在政府主导下、从属于工人阶级的农民阶级属性。以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个代表性国家为例，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的关系演进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20世纪50—70年代：政府主导下渐趋独立的印第安人运动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排斥社会其他群体参与的寡头精英政治陷入危机。此后，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采取了国家干预的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进步的民主政府，还是军事独裁政府，都愿意接纳社会群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城市工会成为主要的民众运动组织。在这一时期，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政府力图淡化印第安民族认同理念，代之以农民阶级的身份认同，通过农民、矿工工会将印第安群体纳入政治体系。印第安农民工会从属于反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城市工会。土地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对传统农业的资金支持，都有利于印第安人社区的发展。但同时，对印第安人居住区自然资源的开发也逐步扩张。可以说，有组织的印第安人斗争最初是由政府主导

^① 徐世澄 《方兴未艾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运动》，载《中国世界民族学会论文集》，2012年8月，第3页。

的，强调印第安人的农民属性，在社会运动中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1. 玻利维亚

1952年，玻利维亚发生了由激进矿工领导、城市工人阶级支持的社会革命，“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人埃斯登索罗就任总统后推行土地改革，得到印第安农民工会的支持。然而，尽管重新分配了土地，但政府并未落实支持传统农业的承诺。1964年，军政府上台。到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巩固政权，军政府制定了《军事—农民公约》，将各农民工会合并为由国家控制的联合会，并承诺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但70年代末实行的土地税和军政府的镇压使得新一代农民工会与军政府的关系渐行渐远。在新一代农民工会中出现了卡塔里斯塔主义思潮，后形成了“图帕克·卡塔里印第安人运动”(MITKA)。卡塔里斯塔主义结合了捍卫农民利益的阶级意识和捍卫印第安民族及文化权利的理念，对此后的印第安人运动影响深远。它提倡建立承认和包容民族多样性的国家，对印第安文化和西方文化兼容并蓄。上述理念在2009年的宪法中得到了体现。^①此外，卡塔里斯塔主义还促成了农民工会与其他社会运动和左翼政党的联合，如与玻利维亚工人联盟(COB)的联合。玻利维亚工人联盟的主导者是矿业工会和工业工会，主张农民阶级以工人阶级为主导。1978年，玻利维亚工人联盟支持卡塔里斯塔农民工会领袖成立了统一、独立的玻利维亚农业工人统一工会联合会(CSUTCB)，代表高原印第安农民的利益，但影响力较小。虽然在这一时期印第安农民运动处于从属地位，但这种联合多阶级形成的跨民族联盟成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反对新自由主义浪潮的重要推动力。

2. 厄瓜多尔

与玻利维亚一样，厄瓜多尔的民众主义政府也以印第安人的农民阶级属性为出发点，主导建立印第安人组织，在高原印第安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军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鼓励印第安人登记为农民身份，依法成立农民社区以强化印第安人的社区地位和传统习惯。^②20世纪60年代，全国农民组织联合会(FENOC)成立。在联合会的支持下，印第安人社区组织了集体行动，要求获得政府承诺的各项权益，如土地、信贷、改善基础设施等。同时，在亚马孙地区，石油开发和土地殖民化促使印第安人组织起来

^{①②} Paul Almeida, et al.,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erspectivas, Tendencias y Casos*, CLACSO,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junio de 2017, p. 238, pp. 238-239.

抗争，特别是舒阿尔人。1964年成立的舒阿尔人联合会被誉为拉美现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运动组织”^①。70年代，高原和低地印第安人也形成了独立的组织。高原印第安人成立了厄瓜多尔克丘亚族印第安人联合会（ECUARUNARI），低地印第安人则成立了厄瓜多尔亚马孙印第安民族联合会（CONFENIAE）。前者的三大核心诉求是土地、尊严和自由，并逐渐取代了全国农民组织联合会在印第安人社区中的影响。后者则主要致力于捍卫印第安领地和民族文化。

（二）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处于对立和对抗的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

20世纪80年代，拉美爆发了债务危机，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在拉美盛行。同一时期，印第安人争取社会经济权益和政治、文化平等权利的斗争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场运动被拉美学术界统称为“土著人社会运动”，几乎遍及了所有有印第安居民的拉美国家。^②

这一时期，印第安人面临双重困境：一是自然资源开发导致印第安人的领地、资源、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被侵蚀；二是印第安人无法得到平等的公民地位和权利，成为国家的“隐形”公民。这样的困境使得这一时期的印第安人运动非常活跃，同时肩负双重使命。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印第安群体构成极大威胁，特别是损害了印第安群体的经济利益，将印第安群体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激发了其捍卫土地和自然资源等经济权益及争取政治权利的动力。印第安民族认同的复苏使得印第安人运动开始谋求建立“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国家并实行民族平等与民族自治政策。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工会力量明显弱化，无力领导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为印第安人运动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契机。印第安人运动成长为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领军者，并实现了与中产阶级组织、城市居民组织、环保组织和劳工组织的联合。有的印第安人运动还发展为政党，直接把斗争推上政治舞台。相较而言，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运动的主导地位更为突出，特别是1986年成立了厄瓜多尔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CONAIE），这种全国性的印第安人联合会在玻利维亚是没有的。^③虽然两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已发展

① 方旭飞《试论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左派政党》，载《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5页。

② 苏振兴《拉美印第安人运动兴起的政治与社会背景》，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页。

③ Paul Almeida, et al.,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erspectivas, Tendencias y Casos*, CLACSO,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junio de 2017, p. 246.

壮大的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印第安人的艰难处境和印第安民族意识的复苏促使其要求承认多民族、多元文化和民族自治。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伴随的是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的对立和对抗。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运动都提出了承认国家的多民族特征和民族自治要求，实现了印第安人组织之间及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合，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占主导地位，并取得了与政府对抗的重大成果。

1. 玻利维亚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玻利维亚产生了两大印第安人组织：一是低地印第安人运动——玻利维亚东部印第安民族联合会（CIDOB），斗争核心是反对农业开发对疆界的扩张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二是科亚苏龙印第安人社区全国委员会（CONAMAQ），其成员是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艾马拉人和克丘亚人。他们居住在偏远牧区，与市场经济脱节，仍采用原始的社区生产方式。

虽然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运动没能形成全国性的协调组织，但在与政府的对抗中仍发挥了突出作用。玻利维亚农业工人统一工会联合会开展了反对埃斯登索罗政府（1985—1989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斗争。该联合会隶属于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玻利维亚工人联盟，但当时的工会并没有能力组织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有效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隶属该联合会的古柯种植者联合会便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古柯种植者联合会在运动中使用印第安人形象，宣传印第安文化，在广大印第安农民和城市劳工组织中很有号召力，成功开展了反对美国主导的根除古柯种植政策的斗争。古柯不仅是玻利维亚印第安文化的象征，也成为反抗外部压迫的民族抵抗的象征。

此后，古柯种植者联合会在桑切斯·德洛萨达政府期间（1993—1997年）领导了“争取生命、古柯和国家主权”大游行。古柯种植者联合会组织城乡民众发起大游行，要求政府承诺撤销强制根除古柯种植的政策，反对私有化，推出鼓励农牧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古柯种植者联合会主导了抗议活动的进程，每次政府对古柯种植者的诉求做出一定让步，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抗议活动就会平息下来。1996年，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达成协议，国家土地管理局无权管辖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使高原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一定保障，低地印第安人的公有产权也得到了法律认可。

2000年，科恰班巴爆发关于水资源权利的斗争。虽然印第安人组织未直接领导运动，但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促成了科恰班巴市及附近

许多地方组织的联合。玻利维亚农业工人统一工会联合会在首都拉巴斯发起广泛的社会动员，将水资源权利纳入其诉求，并把运动推向更多省份。在这一事件中，玻利维亚印第安人运动领导人基斯佩发起了“两个玻利维亚”的争论，即“一个是印第安人的，另一个是白人的”，这“两个玻利维亚”自殖民地时期开始一直处于对抗之中。这一争论使得印第安人的民族认同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从社会或阶级的认同向文化、族群的认同转变。^①2003年爆发了反对德洛萨达政府关于向北美输送天然气的政策的斗争。玻利维亚农业工人统一工会联合会率先举行抗议活动，在埃尔阿尔托市发动广泛的社会动员，得到了来自农村的印第安新移民的大力支持，运动最终形成了多阶层、多民族联盟。埃沃·莫拉莱斯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号召全国总罢工，将运动推向了全国，德洛萨达总统被迫辞职。接任的梅萨副总统在石油天然气国有化问题上的迟缓做法引发了民众抗议，于2005年被迫辞职。

2.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严重威胁着贫困的农村印第安人社区本已捉襟见肘的生存资源，政府的农牧产业化发展也威胁着印第安人的领地、社区和文化。20世纪80年代，舒阿尔人与一些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组建了厄瓜多尔亚马孙印第安民族联合会（CONFENIAE），斗争的核心之一是反对导致土地退化和社区环境恶化的石油开采项目。国际环保组织大力支持该联合会反对跨国企业在印第安社区开采石油的抗议和斗争。

厄瓜多尔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成为与连续几届新自由主义政府对抗的主导力量。联合会提出构建多民族国家，恢复印第安民族的领地、自由、认同和文化，并于1995年参与组建“帕恰库蒂克多民族团结运动”，在全国和地方层面有一定影响力。联合会于1990年6月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大罢工，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共同诉求为基础，与工会、城市街区组织、反自由贸易运动、人权团体、教师协会、公务员行会等社会组织和中产阶级力量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盟，将自身诉求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利益诉求相融合，成为全国性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运动的领军者。杜兰·巴连政府（1992—1996年）推行激进的结构调整措施，大幅降低关税，推行金融和投资自由化及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励以农牧产业化开展土地改革等。联合会于1994年中期组织了第二次大规

^① 徐世澄《玻利维亚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载《世界民族》，2012年第6期，第16页。

模印第安人运动，反对政府鼓励农牧产业化发展的土地法。政府不得不与抗议者协商，在土地改革、农民信贷、水资源权利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然而，继任的布卡拉姆政府全盘否定了前任政府做出的让步，继续深化新自由主义改革，如确定美元作为本国货币使用，推行完全的经济美元化。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于1997年2月再度发起社会动员，迫使执政仅6个月的布卡拉姆辞职。随后，临时政府同意召开制宪大会，帕恰库蒂克多民族团结运动参加了制宪大会，但关于建立多民族国家、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提议未能落实。之后的马瓦德政府（1998—2000年）仍继续实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采取休克疗法。联合会又一次组织印第安人抗议活动，反对马瓦德政府背信弃义行为的呼声将抗议活动推向高潮。2000年，联合会中的一个激进派别支持古铁雷斯上校等军官发动政变，马瓦德逃亡。2002年年末，帕恰库蒂克多民族团结运动加入竞选联盟“1·21”爱国社团党（PSP），其候选人古铁雷斯赢得大选。古铁雷斯上台后，任命多位联合会领导人担任内阁或其他政府机构要职。但随后古铁雷斯的立场发生改变，他挑拨不同印第安人运动组织之间的关系，制造内部分化。联合会的代表性也因此遭到质疑，加上内部冲突使其力量被削弱，号召力弱化。^① 2005年，古铁雷斯众叛亲离，在抗议声中下台。联合会再次组织社会动员，反对临时政府继续进行自贸协议谈判等措施。这次大规模动员迫使政府宣布终止石油开采合同，自贸协议谈判也因美国的不满而暂停。联合会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公信力和动员能力。

（三）2006年至今：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的不同走向

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运动主导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都以左翼政府执掌政权为结果，并在执政第一年都举行了有印第安人组织参与的制宪大会，以新宪法保障和加强印第安民族的地位和权利。然而，此后两国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之间又都因在自然资源开采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生冲突。冲突的根源是，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理念存在根本矛盾。不同印第安民族的利益诉求差异，加之政府的分化策略，又造成两国印第安人运动的内部分裂，使其动员能力和影响力都不及反新自由主义高峰期。但是，两国分别代表了拉美印第安人

^① Paul Almeida, et al.,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erspectivas, Tendencias y Casos*, CLACSO,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junio de 2017, pp. 245 - 246.

运动与政府关系的两种不同走向。在玻利维亚，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的关系一直处于合作与冲突并行的状态。而在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的关系以对抗为主。

1. 玻利维亚

2006年1月，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上台执政，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首位印第安人总统。2009年3月，玻利维亚改国名为“多民族玻利维亚国”(El 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livia)，确立玻利维亚的多民族国家性质，承认玻利维亚民族文化的多元性。2009年新宪法中的多项条文保障了印第安人的政治经济权利，给予印第安人更多的自决权。新宪法第一条规定，“玻利维亚是社群性的多民族权利社会的统一国家”，“以多样性和政治、经济、司法、文化、语言的多元化为基础”；第五条规定，承认“西班牙语和36个印第安民族语言均为官方语言”；第30—32条规定，“印第安民族有权自由地生存，有权拥有自己的文化、宗教信仰、习俗和宇宙观，有权保护传统的医学、语言、习惯和服饰，有权建立自己的体制、媒体和通信手段，有权接受多种文化和语言教育，有权享受免费医疗，有权实施自己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有权分享其居住地的自然资源开发权益，濒临灭绝的印第安民族应得到保护和尊重”；第190—192条规定，“印第安农民有权通过其当局行使司法权”；第289—296条规定，“印第安农民有权在其居住的地区建立自治政府”。莫拉莱斯政府还颁布了新土地改革法，规定国家有权征收闲置土地，并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贫困群体和印第安农民，使“耕者有其田”。为捍卫莫拉莱斯政府，玻利维亚农业工人联合会等印第安人组织发起社会动员，抵御东南部4个富裕省份^①的分裂活动。此外，各主要印第安人运动还与政府缔结了《团结公约》。

但同时，也有印第安人组织对制宪大会的代表性提出质疑，认为政府的代表选举规则造成印第安人组织为获取参加制宪大会的资格而被迫与执政党联合。莫拉莱斯政府与印第安人运动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特别是关于印第安领地的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开发项目，最终导致政府与部分印第安人运动决裂。目前，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运动分裂为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两大派别，焦点是政府对涉及印第安领地的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开发项目应持的立场。支持政府的一派是由玻利维亚农业工人统一工会联合会、玻利维亚跨

^① 这4个省份是东部的圣克鲁斯省、贝尼省、潘多省和南部的塔里哈省。

文化社区工会联合会（CSCIB）和“巴托利纳·西萨”玻利维亚原住农民妇女联合会（CMCIOB-BS）组成。这些组织中的很多成员担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务，还有些成员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占有席位。这些组织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无条件地支持莫拉莱斯政府，针锋相对地对抗反对政府政策的社会动员。反对政府的一派是以玻利维亚东部印第安民族联合会、科亚苏龙印第安人社区全国委员会为代表的亚马孙印第安人组织和安第斯印第安人组织。这些组织坚决反对政府事前不向印第安人社区征询意见就在其领地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项目。^①

2010年莫拉莱斯刚刚赢得连任，其政府就与亚马孙印第安人运动发生了严重冲突。当时，政府计划在拉巴斯北边的印第安领地开采石油。政府拒绝与提出质疑的玻利维亚东部印第安民族联合会谈判，而是逐一与各相关印第安人社区谈条件，以达成实施项目的意图。政府的这种做法激化了其与亚马孙印第安人运动的矛盾。2011年，穿越伊西博洛·塞古雷印第安人保护区和国家公园（TIPNIS）的高速公路项目导致政府与亚马孙和安第斯印第安人运动彻底决裂，《团结公约》名存实亡。印第安人运动认为，在传统的印第安保留地修建公路会破坏生态环境，批评政府不征询相关印第安人社区的意见。而政府称有美国势力和国内反对派在幕后煽动抗议活动。玻利维亚东部印第安民族联合会和科亚苏龙印第安人社区全国委员会发起数次示威抗议游行，支持和反对政府的印第安人运动之间发生冲突。2011年10月爆发的大游行迫使政府暂停公路计划，多名政府高官辞职。2012年7月4日，政府与保护区内大部分印第安人社区达成协议，就是否同意修建公路进行公民表决，但表决中印第安人意见并不一致。政府与亚马孙印第安人运动之间关于修建公路的争端，最终在政府的“镇压+对话”策略下，于2017年8月以政府通过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而告终。但是，政府与亚马孙和安第斯印第安人运动之间的冲突已成为持续存在的政治常态。^②

2. 厄瓜多尔

2007年1月，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党主席拉斐尔·科雷亚宣誓就任总统。科雷亚上台前与印第安人运动已有嫌隙。2006年，科雷亚试图寻求以帕恰库

^{①②} Fabiola Escúrzaga, Raquel Gutiérrez, Juan José Carrillo, Eva Capece y Borrjes Nehe, *Movimiento Indígena en América Latina: Resistencia y Transformación Social*, Vol. 3, 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Benemérit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Puebla, México, 2014, p. 83, pp. 633-636.

蒂克多民族团结运动的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但遭到拒绝。^① 选举第二轮，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才转而支持科雷亚。科雷亚视该印第安人运动为狭隘的利益集团，限制其政治参与。^② 在 2007—2008 年的制宪大会上，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向大会提交建议书，提出五大诉求：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恢复国家主权并掌握经济发展方向，捍卫自然资源和生态多样性，实现政治民主参与，让获得公共服务成为人权的一部分，推行团结、生态、平等、主权和有计划、包容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③ 克丘亚族印第安人联合会、亚马孙印第安民族联合会、帕恰库蒂克多民族团结运动以及农民、印第安人和黑人组织全国联合会（FENOCIN）也都参与了制宪大会。新宪法承认厄瓜多尔是多民族、跨文化国家，明确保障印第安人的基本权利，确定保护环境和集体权利原则，并对一些经济权利给予保障。^④ 但政府与印第安人运动在许多问题上仍存在意见冲突，如印第安人的自决权和自治权、事先知情和征询意见权，以及关于自然资源的开采政策。最后，双方只在争议最小的水资源权利方面达成共识，在宪法中确认获得水资源是公民的基本人权。^⑤

科雷亚执政后，印第安人运动并不认同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在表达自己声音的体制内渠道明显不畅通的情况下，只得继续采取抗议活动的方式。科雷亚执政期间，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与帕查库蒂克多民族团结运动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为印第安人运动的衰退负责。^⑥ 科雷亚政府还采取“隔离”策略，切断印第安人运动区域组织与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如直接与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的基层组织建立联系，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各类社会服务，为印第安群体直接送去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一方面，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逐渐失去了在政府和印第安群体之间斡旋的功能，代表性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区域组织与基层组织之间分歧不断加剧，分裂为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两派，造成全国印第安人联

① 方旭飞《试论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左派政党》，载《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9页。

② Paul Almeida, et al.,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erspectivas, Tendencias y Casos*, CLACSO,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junio de 2017, pp. 251 - 252.

③ Ana Cecilia Betancur J. (ed.), *Movimientos Indígenas en América Latina: Resistencia y Nuevos Modelos de Integración*, IWGIA, septiembre de 2011, p. 93.

④ Paul Almeida, et al.,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erspectivas, Tendencias y Casos*, CLACSO,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junio de 2017, p. 250.

⑤ Ana Cecilia Betancur J. (ed.), *Movimientos Indígenas en América Latina: Resistencia y Nuevos Modelos de Integración*, IWGIA, septiembre de 2011, p. 94.

⑥ 方旭飞《试论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左派政党》，载《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9页。

合会内部分裂。^①

在自然资源开发问题上的冲突立场是政府与印第安人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一个根源。在石油和矿产品的巨大利益面前，尽管冲突频频，科雷亚政府始终不愿放弃开采项目。2007年6月，亚马孙中部地区印第安人爆发反对跨国石油公司开采活动的抗议。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对抗议活动实行军事镇压，宣布实施国家安全法。政府颁布的有关矿业和水资源法律触发了印第安人的怒火。2008年，克丘亚族印第安人联合会和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先后召开特别大会，决定召集全国性社会动员，捍卫“土地母亲”，促使政府搁置《新矿业法》。2009年1月，在印第安人运动的号召下，全国反矿业开采示威游行爆发。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还向美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新矿业法》，表示绝不允许在未经事先征询的情况下在印第安领地开发矿产资源。2009年，政府公布《水资源利用法》草案。在草案制定过程中，印第安人组织的参与受到严格限制。印第安人运动希望保证印第安人社区参与水资源管理的权利，保证水资源利用与“土地母亲”和谐并存，但其期望落空。2009年9月，全国印第安人联合会与水资源利用组织联合发起“捍卫水、生命和多民族国家”动员。在亚马孙地区，警察与示威者的对抗造成一名舒阿尔人死亡。之后，政府和印第安人运动相互指责、抨击，并逐步演变为持续的对立和对抗。2013年，亚苏尼国家公园油藏开采项目再度引发政府与印第安人运动的冲突。科雷亚曾于2007年承诺永不开发亚苏尼国家公园油藏，为此厄瓜多尔将得到来自国际社会共计36亿美元（约合30亿英镑）的补偿款。然而，科雷亚政府于2013年宣布放弃承诺，石油开采项目于2016年正式启动。

三 不同时期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的成因： 基于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分析

从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代表性案例来看，在21世纪初拉美左翼浪潮之前，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的演进经历了从主导—从属到对立对抗两个阶段，而在之后则出现了合作与冲突并存和以对抗为主的两种不同走向。

^① Paul Almeida, et al.,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erspectivas, Tendencias y Casos*, CLACSO,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junio de 2017, p. 252.

这种现象反映了拉美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之间关系及其融合度问题的演变。

“认同”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语名词“identity”及其蕴含动态含义的衍生词汇“identification”翻译而来。这个哲学与逻辑概念首先被引入心理学领域，指个体或群体在情感或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群体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是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①之后，“认同”概念被应用到人文和社科领域。民族认同^②指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身份的认知、忠诚和归属感。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民族认同是拉美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因而成为影响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的重要因素。

20世纪20年代，阿普拉党领袖阿亚·德拉托雷提出“印第安主义”，引起人们对印第安人问题的重视，但并没有把印第安族群视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动参与者。同一时期，“一体化印第安主义”（又称“民族一体化”）理论发源于墨西哥^③，其影响后来扩展至十多个拉美国家。“一体化印第安主义”强调保留和尊重印第安人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宗教等，保障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利，吸纳印第安人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一体化印第安主义”理论在拉美不同国家的实践确实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墨西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进行的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第安人的土地问题。该理论的本质是在承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将印第安人融入民族国家构建。然而，政府运用其掌握的政治资源，主导构建的是以主体民族价值为标准的“同质性”国家认同。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政府有意淡化印第安民族认同，代之以农民身份认同，主导建立印第安人组织，通过农民、矿工工会将印第安族群纳入政治体系。国家试图抑制民族差异性和多样性，将事实存在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强行整合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逻辑，形成了政府与印第安人运动之间的“主导—从属”关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第安人组织渐趋独立，萌生了对“一体化印第安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开始产生承认国家多民族、多文化特征的诉求，

① 袁娥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载《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第92页。

② 本文采用狭义的“民族认同”概念，国内学者也使用“族群认同”一词，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 identity”相对应。

③ 吴德明 《拉美印第安人问题》，载《世界民族》，1995年第2期，第41页。

如玻利维亚的卡塔里斯塔主义。这种印第安民族认同的萌芽在八九十年代生长成熟。一方面,资源丰富的印第安人传统领地不断遭到侵占,印第安人的切身利益乃至生存受到威胁,迁徙到城市的印第安人处境孤立、备受歧视,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医疗、教育、就业等权利没有保障,处于贫困、被排斥和边缘化境地的印第安人渴望改变命运。他们逐渐意识到“一体化印第安主义”的实践和资本入侵对印第安民族认同的侵蚀。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印第安人社区逐渐形成自己的互助组织、邻里组织、政治组织和生产组织等,他们共同的种族身份得到认同。^① 国际组织倡导的印第安人权利保护、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和实践,也潜移默化地唤醒并强化了印第安人对本民族身份认同的意识。印第安族群中的有识之士利用国际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如1992年危地马拉基切族妇女门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印第安民族认同和印第安人运动产生极大的鼓舞作用。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保组织与印第安人组织乃至印第安人社区协作实施项目,如共同推进原住民土地划界、国家公园划界,支持印第安人社区发展替代型经济、生态经济和小规模经济,倡导环境立法等^②,促使印第安族群更加关注印第安语言和宗教等本民族文化传统。另外,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工业化进程、贸易自由化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印第安人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使其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日渐成熟的印第安民族认同推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印第安人运动的崛起,承认国家的多民族、多文化特征和民族自治的要求上升为印第安人的核心诉求。尽管不少拉美国家在宪法中承认印第安人的权利和民族特征,承认多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印第安人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权利,但事实上,由于国家的多民族特征没有得到承认,民族自治的要求无法得以实现,印第安族群仍不能得到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尊重和平等的权利。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高度不融合,使得这一时期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始终处于对立和对抗状态。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拉美迎来了左翼运动高潮,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掌握了政权。之后,拉美的民主多样性进一步发展,一些左翼执政国家

^① 苏振兴 《拉美印第安人运动兴起的政治与社会背景》,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3期,第5-6页。

^② Paul Almeida, et al.,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erspectivas, Tendencias y Casos*, CLACSO,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junio de 2017, p. 241.

的“参与式民主”实践^①使其成为拉美向多元民主转型的代表，印第安人运动对承认国家多民族特征的诉求得到政府回应。玻利维亚在2009年新宪法中确立玻利维亚的多民族国家性质，承认玻利维亚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对印第安人的政治经济权利提供保障，给予印第安人包括建立自治政府在内的更多自决权。依据宪法，玻利维亚建立了四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除传统的行政、立法、司法权力机关外，还增设了多民族选举机构作为第四种国家权力机关，此外还成立了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多民族立法大会”，并规定后续立法及宪法修订需经土著人全权制宪会议通过。厄瓜多尔2008年新宪法承认厄瓜多尔的多民族特征，规定了承认、尊重和保护印第安人的特殊权利。依据宪法建立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权力机关之外，增设“国家选举委员会”和“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委员会”。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运动都参加了左翼政府的制宪大会，在新宪法中实现了承认国家多民族特征的诉求，但在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融合度问题上的差异使两国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呈现不同走向。在玻利维亚，国家承认、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承认、包容和尊重印第安民族文化，并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玻利维亚宪法保障印第安人在居住地建立自治政府的权利，玻利维亚农业工人统一工会联合会和玻利维亚东部印第安民族联合会等印第安人运动都参与了印第安民族自治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由于印第安人也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人格、尊重及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和机会，民族自治已成为国家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印第安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转化为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作为印第安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与作为玻利维亚公民的国家认同实现了较为有效的调和与统一，因此玻利维亚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的关系从整体上看以合作为主线。而厄瓜多尔则代表了拉美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未曾真正实现向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转变。科雷亚政府的“公民革命”理念曾给印第安人带来希望。印第安人为获得平等、受尊重的地位和权利，要求承认国家的多民族特征和民族自治，但对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认识差异，使印第安人运动与执政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党在制宪大会期间就冲突不断。虽然2008年新宪法承认厄瓜多尔的多民族国家特征，但科雷亚政府实际上并未将印第安民族认同

^① 袁东振 《拉美国国家民主巩固与转型的趋势及困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第24页。

作为国家构建的组成部分，漠视印第安人对领地、公民权、自治和自决权的诉求，强制推行大肆开发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台一系列注重维护跨国企业利益的法律，逐步侵蚀印第安人运动在制宪大会上取得的成果。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运动在历经漫长的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阶段和与政府对话的调和阶段之后，最终与政府决裂，双方陷入持久的对抗。只有国家承认和保障印第安人的自治权和领地，保证宪法赋予印第安人的各项权利得到尊重和实现，才有可能实现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融合。在当前印第安人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感极低的情况下，厄瓜多尔无法构建真正的多民族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发生了以开发印第安领地自然资源为焦点的冲突。莫拉莱斯政府和科雷亚政府开发国家公园和印第安领地，未事先向当地印第安人社区征询意见就开始开采石油、矿产和木材，修建公路、建设水电工程，还废除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政府试图掩饰自然资源开发与其“美好生活”执政理念的背离，如宣传开采项目所得收益将用于社会福利项目，将印第安人的语言、礼仪、风俗纳入政府对开采项目的宣传和庆祝等，还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逐一游说相关印第安人社区。这种“新榨取主义”^①的发展路径引发了印第安人运动的抗争。不同的是，两国政府这种有悖于印第安传统文化中“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做法，在玻利维亚仅表现为利益相关的印第安群体及其代表组织与政府发生矛盾冲突，而在厄瓜多尔则导致政府与印第安人运动形成针锋相对的对抗态势。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案例研究结果还表明，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的关系与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左”或“右”并无直接关联。拉美传统左派的确对印第安人运动有促进作用，但仍以阶级作为政治认同的基础，不认同印第安人运动对种族和文化差异权的诉求。拉美新左派淡化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动员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所有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广大社会阶层，把尊重差异性、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等均纳入其主要诉求。但同时，在一些新左派执政国家，新左派政党与印第安人运动之间的竞争和分歧使得印第安人运动的政治空间甚至更小。^②

^① [美] 丽贝卡·霍伦德 《“后增长”在南半球：拉丁美洲发展替代运动的出现》，载《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16页。

^② 方旭飞 《试论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左派政党》，载《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4期，第30页。

四 小结

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认为，印第安人运动是一种反对构建市场导向社会的运动方式。他指出，人类的自我保护本能引发了资本/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一方面，资本强制实行自由调节的市场经济，使政策和社会与之相协调；另一方面，市场的猛攻引起了社会自我保护的自然防御反应。^①在拉美，新自由主义模式试图构建市场导向社会，对印第安人运动等社会力量捍卫的自然保护机制形成巨大冲击。即使在左翼执政的国家，政府与印第安人运动之间在发展模式方面也存在意见分歧，进而造成矛盾冲突甚至对抗。

拉美印第安人争取经济权益、尊严、平等、公正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印第安民族认同的复苏进一步丰富了印第安人运动的内涵，突破了捍卫领地、资源和居住环境的经济诉求，扩展到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提出建立承认“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国家并实行民族平等与民族自治政策。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相互关系和融合度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案例分别代表了21世纪初以来的两种不同走向。要处理好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使之相互协调和融合，首先要承认并尊重印第安人对自身历史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认同，进而赋予并保障印第安人平等的公民地位和权利。但在拉美，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偏见由来已久，带有“排斥”和“边缘化”色彩的制度和政策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因此，拉美印第安人的艰难处境非短期内可以改变，处于内部分裂、力量遭到削弱的拉美印第安人运动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责任编辑 王帅)

^① Paul Almeida, et al., *Movimiento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erspectivas, Tendencias y Casos*, CLACSO, Ciudad Autónoma de Buenos Aires, junio de 2017, pp. 253 - 254.

uses the method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sort ou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Argentina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strategy of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pulism ar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itial path of economic growth in Argentina. By calculating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Argentina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low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Argentina is the key factor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low growth rat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structural factors of Argentina, explores the causes of long-term devi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populism, electoral politics and the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h endogenous conflicts are reflected in aspects such as the high welfare, the difficulties in capital formation, lack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ong-term difficulty in upda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Argentina, 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Populism, public choice

- 101 The Indigenous Movements of Latin America: Features, Historical Process and Contributions
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indigenous movements have called attention to a special dynamism of political life in Latin America, due to the anti-systemic and anti-capitalist movements of a new type in this region. Within the vast set of those powerfu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indigenous movements have gained a prominent role and managed toward a central place. This article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features of the main indigenous movements in today's Latin America, and find out the reasons behind the enormous protagonism of these indigenous movements, which has increased in an exceptional scale since the 1990s. In reality, the persistent indigenous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ole played b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world capitalism in the last five years within economic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 Latin American indigenous movements have made specific contributions to the broader set of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se contributions enrich the anti-capitalist movements of the world, making the current criticism of the world capitalism more complex, more acute and pervasive. They also bring clos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on-capitalist world in future expectations.

Key words: indigenous movement, anti-systemic, anti-capitalist, Latin America

- 117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n Movement and Government in Latin America: The Cases of Bolivia and Ecuador
Fan Lei

Abstract: The Indian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arena and one of the forces in regional social movements. Through the case studies of Bolivia and Ecuad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 features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an movements and the govern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From 1950s to 1970s , the Latin American Indian organizations were mainly founded by the initiatives of the governments , which led to the domination-subordination relationship , but then the Indian movements became gradually independent due to the awakening of Indian ethnic identity. From 1980s to early 21st Century , the increasing Indian ethnic identity made Indian movements not only champion land rights , national aut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luri-national states , but also become the main force against the neo-liberalism , which led to their confronta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Since 2006 , the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resulted in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an movements and the governments. Only by recognizing and respecting the Indian ethnic identity , confirming and protecting their equal citizenship status and civil rights , can we righ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a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so as to build authentic pluri-national states.

Key words: Latin America , Indian movements , ethnic identity , pluri-national state , national autonomy

136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The Case of Bolivia

Li Han

Abstract: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 the rise of ethnic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has been marked by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igenous or ethnic par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parties in this region has been hindered by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 inadequate resources and low level of ethnic consciousness. Along with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 the formation of indigenous parties is the product of broa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As the most successful indigenous party in Latin America to this day , the 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MAS) has been the product of years of indigenous mobilization in Bolivia , and has relied heavily on the support of broad networks of social movements. MAS has not caused ethnic conflicts in Bolivia compared with the ethnic 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Its success can be mainly attributed to its inclusive political strategy in order to keep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adapt itself to domestic situation. Although indigenous parties in mo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not been able to duplicate the electoral achievements of the MAS and may have little chance of coming to power , they have nevertheless successfully reshaped the politics of the region. The emergence of indigenous parties has yielded great effects on their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Key words: Bolivia , MAS , ethnic politics , ethnic party , Indians

(黄念 审校)